

文憑、過度教育與經濟發展

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專任教授

一、前言

最近看了一篇有一萬六千多人瀏覽過的評論，它所提的問題與觀點意味深遠，值得進一步討論，它的題目是〈教育可以「人本」，教育政策不可不「物質」！〉，在文中作者的觀點顛覆了一般教育哲學的認知，他說：「經濟的產業政策影響了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則又進一步落實在教育制度與教育執行上。適當產出人才，以平衡就業市場，這就是教育政策一個很大的目標。因此，政府的教育政策本來就不是為了讓所有人自我實現，而是為了讓大家能有份工作餬口」。因此，依作者的邏輯「對於學生而言，『學校教育的目的在於學習未來能夠就業的知識與技能』」來講，本來一個人在離開學校教育之後都要去找工作的，因此一個政府若能在學校教育中就為國民做好就業的準備，在理論上與社會穩定上都是順理成章的做法（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2016）；不過本文認為，這是僅就作者對教育的特殊理解來說是如此。

二、臺灣的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與文憑病

站在教育的立場，雖然本文不讚同上述作者的觀點，但其看法似乎也道出了我國一向以來教育政策的實情，例如 2107 年 10 月 23 日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強調，人工智慧（AI）是非常重要的產業，請教育部等相關部會檢視我國的教育政策能否滿足未來上萬個人工智慧人才需求（政治中心台北報導，2017）。其實自從 1980 年代美國史丹佛大學大規模地進行教育產業化並獲得巨大成就以來，引起各國競相模仿，教育應配合產業的需求似已成定論，也是各國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據了。

沒錯，產業發展需要高等人才，但這樣的發展卻也引發現代社會的一種特殊的病症，即「文憑病」（Diploma Disease）。早在幾十年前 Ronald Dore 在其《文憑病——教育、資格和發展》（Diploma Disease：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一書中就觀察到這種文明病，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處於極度的困境中，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努力地追求著文憑，而不是追求好的教育。在全球發展中的區域裡，Dore(1976)指出學生都為了教育文憑感到焦慮，特別是文憑構成足夠的條件，讓學生能夠在現代的經濟部門中獲取工作。換句話說，學校教育變成一種競爭的場所，在學校的階梯裡如果可以爬得夠高的話，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文憑價值。

簡言之，現代學校教育不僅肩負著傳授知識技能的職能，還發揮著製造這入場券，即畢業文憑、資格證書的功能——人才及個人收益的分配的社會功能。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的所得個人收入實在相差太懸殊了。在臺灣，我們把現代部門的這些從業者稱為「科技新貴」，用以指稱那些年薪動輒好幾百萬的科技從業者，羨煞那些非典型就業者或流浪教師。

但追求高薪就是教育的目的嗎？

讓 Dore(1976)感到最痛心的就是現代教育的變質，「追求知識、真理的教育蛻變為追求學歷文憑的教育，教育的相對的實質水準普遍下降，受教育者關心的只是為了獲得『證明自己曾經學習過的一張證明』」。

三、高等教育產業化與過度教育

事實上，從 80 年代美國高等教育產業化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並高度地擴張國力的之後，引起世界各國競相模仿，各國政府無不大力地擴張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其假定當就是，當國民的教育水準愈高時，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競爭力會相應地推昇，教育似乎只是為了追求經濟發展，無形中，教育價值也就等同於經濟價值了，這就是為何現代社會會有文憑病的重要肇因。

如果讓每個國民都能擁有一張高等教育的文憑，就能帶動產業的繁榮，創造經濟奇蹟，就如同美國的高等教育產業化一般，將教育力轉化為生產力，將知識轉化成黃金，那麼，我國這幾十年來不斷地擴張高等教育，讓每個高中畢業生都有大學學歷的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應當為我國帶來另一波經濟奇蹟才對。

事實並不然，臺灣近一二十年來經濟的低迷，企業不斷地出走，失業率高居不下，不但讓它從亞洲四小龍龍首的寶座上滾下來，還遠遠地被其它三小龍甩到後頭，連新崛起的中國大陸都讓我們瞠乎其後了，到如今，甚至東南亞各國都快超越我們了。是的，在臺灣，新生代們真的如願地每個人都能走進大學這個「大門」了，並且獲得以往被視為異常珍貴的文憑了，但這樣的高等教育產業化的政策並沒有把他們的知識變成黃金。我們不禁要問：何以致之？

本文認為，認為文憑能救得了經濟實際上是一種迷思。因為高等教育產業化最大的危險就在於它為社會帶來過度教育(over-education)的惡夢及其帶來的一連串社會危機。

這裡所謂的「過度教育」指的是，由於政府過分擴張教育，高等教育畢業生數量的快速增長開始超過勞動力市場的實際需求，受教育勞動力面臨著知識失業，或者以較高的學歷選擇了較低階低薪的工作，所受的較高教育形同無效(傅祖壇、楊佳茹、黃美瑛，2016)。

許多模仿美國高等教育業業化政策的國家，其擴張高等教育的目的，最重要創造經濟價值，而就個人而言，就是能學以致用獲得較好的工作，提升個人社會地位。然而臺灣所實施的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以政治與經濟力量同時拉動高等教育人口，這裡不僅有高教資源稀釋、降低高教品質問題，亦有嚴重的供過於求的問題，導致大量的高等教育水準的畢業生不得不低就於不需要高學歷的工作，高等教育貶值，形成「學歷通膨」(degree inflation)(林永豐，2014)，當實際教育程度超過目前工作所需具備的教育水準，也可以稱為利用不足(underutilization)(傅祖壇、楊佳茹，2010)，它不僅是人才的浪費，也是社會有限資源嚴重的浪費。

四、過度教育下的結構性失業大潮

在高教產業化推動下的過度教育將導致一連串的症候群，它們是失業大潮、結構性的失業以及結構性的低薪、無法結婚成家、少子化愈加嚴重…等無窮的後患。在本文中，由於篇幅所限，僅就失業問題加以剖析。

談到臺灣目前大學畢業生的失業，中央研究院院士、前經建會主委胡勝正指出，一個大學畢業生出社會時約二十二歲，踏出第一步如果受到重大阻礙，將影響他之後四十到六十年的人生。假如失業一旦超過一年，社會新鮮人就必須面對新一波畢業生的挑戰。結果，高等教育產業化後所培育的三、四十萬名青年，他們一旦失業，二十年累計下來，成為國家、社會、家庭沈重的負擔(引自程晏鈴，2014)。

事實上，如此的境況不獨我國為然，除了美國以外，幾乎所有實施高等教育產業化政策的國家皆是如此，而且問題都日益惡化，特別在全球經濟低迷下，青年失業潮如海嘯一般一波波地衝擊著各國的社會與政治。例如一樣實行高教產業化的韓國，在 2013 年，大批大學畢業生湧出校園，使應屆畢業生和青年就業形勢更加惡化，據調查顯示，截至 6 月底，韓國仍有近 140 萬應屆大學畢業生未找到工作或放棄就業，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還不到 70%(全峻賢，2013)。而在 1999 年開始進行高等教育產業化的中國，其情況也一樣，大量擴張高等教育，高教畢業生每年以 20% 的速度增長，到了 2010 年，由於擴張太快，市場需求小於供給，高教產業化的結果，開始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問題。但與此同時，卻又有 45% 的企業找不到它所需要的人才(杜海玲，2008)。

所謂「結構性失業」問題，就是過度教育造成的併發症，結構性失業的問題比一般失業問題更難克服，因為它是由於在學校所學技能無法應付工作需求，所以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去克服。一般國家很容易忽略結構性失業的殺傷力，尤其在分工越是精密的現代化社會，「隔行如隔山」的效應會不斷極大化，它不像初期現代化時代，一個被紡織工廠開除的員工可以輕易轉換到鐵工廠上班，建築業不要你了，你馬上就可以在製鞋工廠找到另一份工作，因為越是原始的產業越不需要依賴那麼高度的專業能力，像上面所說的，現今連幾年前所培養的資訊科學相關科系人才都無法轉換到現在極其精密的軟體工程，更遑論其它領域要來跨界，因為在高科技產業中，一個企業所需要的學歷和專業力已經不是公司老闆開個為期一週、一個月的在職訓練就可急就章的；面對結構性失業，一般是通過學校教育培育人才來解決，所以其所需時間往往很長；問題是，在當前自由經濟激烈競爭下，各國都在透過高等教育產業化加快研發速度，產業輪動的速度非常快，於是經過數年高等教育培育出來的人才，又成了過度教育，過度教育又讓結構性失業問題更加難解、更加嚴重，如此惡性循環，好像是永遠都醒不過來的惡夢(王振輝，2016)。

過度教育所形成的結構性失業，是現代一種很特別的失業，有人就把它叫做「知識失業」(educated unemployment)，根據國際勞工局的定義，知識失業是指受過教育的知識勞動者處於不得其用的狀態。目前，對知識失業的具體界定比較一致的認識是：知識失業是指一部分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界勞動者找不到工作或屈身做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從事的工作(引自康文艷，2006)。

導致這種知識失業的原因，大多由於科技日新月異高度發達，拜現代科技產業性質與機械化生產所賜，因為這些產業投資報酬率最大，所以吸走最多的資金，但它所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其實卻是最少的，因為高科技產業所需要的是精兵而不是勞動大軍，是高級工程師，而不是一般工程師，例如用一百億美金開設的軟體公司可能只需要雇用 1 千名高階工程師，它會創造出巨大的經濟產值，可是對整體社會的就業率來說並沒有什麼幫助。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在 2016 年初便預測，由於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崛起，將導致全球 15 個主要國家在接下來 5 年淨減 510 萬個工作機會(中央社，2016a)。於是，在這種科技產業畸形發展中，它不但會造成知識失業，而且還扭曲社會財富的分配從而扭曲社會結構，造成 M 型社會，即社會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絕大多數的人就淪為赤貧的失業一族。事實就如世界經濟論壇所指出的，世界上最富有 1% 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比全球其餘人口加起來還要多。而貧窮對抗機構樂施會 (Oxfam) 發表報告也指出：「失控的不平等持續擴張，已導致世界 62 名最富者，擁有全球一半人口財富的總和」(中央社，2016b)。

五、結論

原先我國高教產業化也是要解決我們因為產業外移與產業衰退、新興產業崛起，所以需要大批大批地培育新興產業所需要的人才，然而，過度培育的結果，它反而使結構性的失業更加嚴重，並且進一步扭曲社會結構，造成社會痛苦指數不斷飆高。

由於可見，在現代社會，文憑並不等經濟，獲得文憑也不等於成功。高等教育仍應以開發學生潛能、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促進健全社會的發展為其主要目的，而不是服務於某個特殊產業。

參考文獻

- 一個分析師的閱讀時間（2016年5月10日）。教育可以「人本」，教育政策不可不「物質」！**天下雜誌**。取自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14/article/4240>
- 王振輝（2016年）。**奴化大學：自掘墳墓的教育**。臺北。五南出版社。
- 中央社（2016a）。人工智慧崛起 未來5年淨減510萬職缺。**中央社**（臺北），1月18日。
- 中央社（2016b）。全球一半財產 在最富62人手中。**中央社**（臺北），1月18日。
- 杜海玲（2008年）。高校畢業生結構性失業問題研究。**經濟研究導刊**，14，219-228。
- 林永豐（2014年）。有關學歷通膨概念的幾點釐清。**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12），1-3。
- 全峻賢（2013年7月24日）。韓國結構性失業危機：高學歷者就業難。**第一財經日報**（上海）。
- 政治中心台北報導（2017年10月23日）。星期天拚場開會 賴揆：教育政策應滿足AI產業需求。**蘋果日報**。

- 康文艷（2006）。知識失業——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甘肅農業，2，183-189。
- 程晏鈴（2014年12月9日）。青年失業潮何時退？天下雜誌（臺北）。
- 傅祖壇、楊佳茹、黃美瑛（2016）。過度教育與薪資之關係：臺灣地區大學近期畢業生之研究。應用經濟論叢，99，1-36。
- 傅祖壇、楊佳茹（2010）。臺灣地區大學近期畢業生之過度教育研究。臺灣經濟學術研究網。引自 <http://goo.gl/seGiAZ>,
- Dore, R. (1976). *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